

【农村社会发展】

# 村社本位与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机制与绩效

梁伟

(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推动农业规模经营进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议题。鹤镇的经验表明,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是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的重要机制,该模式实现了现代农业与村庄社会的有效融合。这一模式的实践运作依托三个重要机制:一是地方政府引导,即通过制度供给、政策激励、风险防控等方式引导村社集体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二是村社集体统筹,即统合分散土地以实现整体流转,从而统筹协调农业规模经营实践;三是农民自主参与,即农民自主确定农业经营主体,民主协商地租价格,与农业经营主体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在该模式下,农业经营规模适度且经济效益较高,农业经营的社会效应溢出,农业经营的村庄治理效应较为显著。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和农业规模经营发展,应当注重农业规模经营与村庄社会的有效融合,以促进农业与农民福利、村庄社会同步发展。

**关键词:**农业规模经营;村社本位;内生发展;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22)05-0051-11

##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规模经营是全球农业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方向<sup>[1]</sup>。土地流转是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前提之一<sup>[2]</sup>。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4 年农村承包地流转面积为 0.58 亿亩,2018 年农村承包地流转面积超过 5.3 亿亩<sup>[3]</sup>。土地大规模流转极大地推动了农业规模经营,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然而,农业规模经营仍然存在效率低下、与村庄社会脱嵌等一系列问题。2021 年中央 1 号文件明确要求,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经营主体,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这表明,农业规模经营应当以农民和农村社会发展为前提,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此背景下,如何推动农业规模经营发展,从而增加农民福利、促进村庄社会发展,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议题。

对于农业规模经营如何发展的问题,学者们展开了深入讨论,形成了三个重要议题:一是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基础。学者普遍认为,农业规模经营需满足一定的外部条件,如产权、劳动力转移、农业科技与农业补贴、中介服务组织和土地流转制度等<sup>[4-8]</sup>。部分学者还指出农业规模经营的社会基础,即分化的农户及其对土地不同程度的依赖和异质性流转意愿<sup>[9]</sup>。二是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主体。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我国形成了以承包农户、中坚农民、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促进了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的转变<sup>[10-11]</sup>。学者们对于何种经营主体更适合中国莫衷一是,部分学者立足于村庄治理的角度强调中坚农民的重要性<sup>[12-13]</sup>,部分学者则认为家庭农场是更为理想的农业规模经营主体<sup>[8,14-15]</sup>。三是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方向。当前还有学者主张农业规模经营应当走资本化、现代化的发展

收稿日期:2021-04-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合作制社会企业视角下贫困村集体经济的股权扶贫机制研究”(17CSH070)

作者简介:梁伟,男,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之路,其关键是推动资本下乡。资本下乡重构了农业生产关系和市场关系,推动了农业转型和农民增收<sup>[16-17]</sup>,但也为村庄社会带来诸多消极影响<sup>[18]</sup>。资本主导的农业规模经营具有去社区化特征<sup>[2]</sup>,重塑了农村阶层结构<sup>[19]</sup>,引发农民无产化和边缘化<sup>[20]</sup>,解构了村庄治理公共性<sup>[21]</sup>。以上关于农业规模经营发展的讨论具有启发性,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农业规模经营需要以村庄社会为基础,这是农业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以往的研究尽管大多关注到农业规模经营与村庄社会的关联性,但其将注意力集中于农业规模经营对村庄社会的负面影响,而未能进一步探讨农业规模经营与村庄社会建立正向关联的可能性及其方式。第二,以往的研究讨论了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基础、发展主体和发展方向,但并未触及农业规模经营发展的根本问题,即农业规模经营如何促进农村社会发展。有学者提出,农业规模经营应当以社区为本位,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与社区融合<sup>[22]</sup>。然而,对于农业规模经营如何与村庄社会融合进而促进村庄社会发展这一问题,学者们未进行深入讨论。由此,本文提出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路径。

内生发展这一概念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由日本学者根据实践经验提出,经联合国进一步发展后被广泛认可。内生发展是对发展中国家乡村发展模式的反思<sup>[23]</sup>,它是一种“自我导向”的发展过程,乡村在此过程中利用乡土资源创造价值并在地区内重新分配,实现自主发展<sup>[24]</sup>。内生发展包含以下要点:一是以乡土资源为基础;二是以本地居民为主体;三是强调自立性和自主性;四是发展成果在本地区分配;五是地区发展整体性。前三个要点可以理解为内生发展的组织原则,回答的是内生发展如何可能的问题。后两个要点可以理解为内生发展的分配原则,回答的是内生发展有效性问题。本文认为,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是乡村主体借助农业资源创造经济利益并在本地区重新分配,增进农民福利和促进村庄发展的过程,其核心在于实现农业规模经营与村庄社会的有效融合。结合鹅镇的农业规模经营实践和相关文献,本文试图分析不同农业规模经营模式的发展困境,并以“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为基础,分析该经营模式的运作机制及其与村庄社会融合的方式,并考察该经营模式的实践绩效,以此说明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如何可能以及何以有效的问题。

## 二、农业规模经营模式的困境与变革

鹅镇位于长江南岸沿江平原与丘陵山区的交错地带,人口约为2.5万人,耕地面积超过2万亩。2000年前后,由于村民大量外出务工,鹅镇下辖的8个行政村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土地抛荒问题。2008年,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鹅镇开始发展规模农业。历经多年探索,鹅镇逐渐形成了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模式,该模式不仅大大提高了农地使用效率,而且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发展与村庄社会有效融合。在10余年的艰难探索中,鹅镇经历了多次农业经营模式变革,即2008年以前的自发的小规模农业经营模式、2008—2016年的行政主导的大规模农业经营模式、2016年以后的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模式。

### (一)自发的小规模农业经营模式及其困境

自发的小规模农业经营主要包括小农户经营和中农经营。小农户经营指的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集生产与消费于一体,从事农业小规模经营<sup>[25]</sup>。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小农户家庭经营一直是农业经营的主流模式。20世纪90年代后期,鹅镇青年劳动力向外转移,进入长三角地区务工。年轻人外出务工后,中老年人逐渐成为农业经营主体,由此形成了以“半工半耕”为特征的小农户经营模式<sup>[26]</sup>。进入21世纪,县域经济发展吸纳大量在村中老年人就业,中老年劳动力非农化就业比例持续增加;与此同时,土地细碎化问题使得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不少农户将土地流转给亲戚朋友耕种。一些在村劳动力通过土地流转将经营规模扩展到20~30亩,成为中农<sup>[27]</sup>。基于此,鹅镇形成了以小农户经营和中农经营

为基础的小规模农业经营模式。

小农户经营的优势在于精耕细作,农民为自己的利益耕作,生产积极性很高且劳动监督成本低<sup>[28]</sup>。但是,小农户在对接现代农业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其一,小农户经营相对分散,难以实现规模化经营;其二,小农户对农业生产技术的反应较为迟缓,生产技术更新速度慢,农业机械投资少;其三,小农户分散经营的状态与现代农业产业分工体系存在结构性矛盾<sup>[29]</sup>,小农户失去了主体性,对农业现代化构成了阻碍。

中农经营不仅具备小农经营的精耕细作优势,还有较强的采用农业新技术的动力和能力<sup>[27]</sup>。相对于小农户经营,中农经营的生产效率较高。但土地细碎化问题导致了较高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农业经营规模普遍被限制在20~30亩。因此,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在村农户耕作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耕作不便、质量较差的土地均被抛荒,严重影响了农业现代化。

## (二)行政主导的大规模农业经营模式及其困境

2008年,鹅镇政府以土地抛荒治理为契机,借助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等部门项目对本镇耕地进行集中整治。土地整治不仅实现了土地集中连片,而且极大地改善了土地耕作条件。土地整治后,为解决谁来种田的问题,鹅镇按照“整体流转”的思路,依托村集体将分散在农户手中的土地经营权统合起来,整体流转给农业经营主体。在土地流转环节,鹅镇政府明确限定农业经营规模必须达到500亩,以此推动大规模农业经营。此后,鹅镇陆续出台了土地流转补贴政策、农业保险政策和农地整治项目等激励措施,以推动工商资本下乡,发展农业规模经营。

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整治后的农田大多流转给了以工商资本为主导的农业企业。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后,改变了分散化、细碎化的农业经营格局,实现了土地连片耕作。相较于小农户和中农,农业企业拥有雄厚的经济资本,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使用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进而有助于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

而行政主导的大规模经营存在诸多问题:其一,农业企业主导的农业规模经营是对小农户和中农的排斥。土地整治后,除愿意耕种土地的农户保留了与其承包面积相同的自耕地外,其余土地均按照地方政府的要求整体流转,小农户和中农因不具备农业规模经营的条件而被排斥在外。外来资本主导的农业规模经营却高度脱嵌村庄社会<sup>[2]</sup>。其二,农业企业的经营存在投机行为。鹅镇政府为激励农业企业流转土地,出台了大量激励政策,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农业企业的投机行为。农业企业的投机行为主要是套取各类政策性农业补贴,通过申请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从中牟利。其三,农业企业的生产效率较低。农业企业必须利用雇工开展农业生产活动,磨洋工问题必然会出现在农业生产过程之中<sup>[30]</sup>。

行政主导的大规模经营并未取得地方政府预期的效果,反而引发了较多的农业治理问题。鹅镇政府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过度介入,使得农民与农业企业的二元市场关系变成了“小农-政府-农业企业”的三角关系,一旦出现土地流转风险,地方政府便成为首要的责任主体。

## (三)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模式及其产生

在自发的小规模经营模式下,农业经营主体来自村庄,农业经营收益也基本留在村庄,这对村庄治理和村庄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这一模式存在规模效益差、土地利用率低等问题,难以充分发挥土地的经济价值。在行政主导的大规模农业经营模式下,农业经营主体来自村外,农业经营收益也流向村外,外来主体与村庄社会高度脱嵌,无助于村庄社会发展。行政主导的大规模农业经营模式虽然实现了土地集中利用,却未能大幅提升农业生产效益。

当上述两种农业经营模式难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良性发展时,鹅镇开启了农业规模经营模式的变革。2016年,鹅镇总结过去10余年农业规模经营的经验和教训,从三个维度推动农业规模经营良性发展:一是调整农业经营规模。鹅镇对大规模农业经营模式进行反思,认为适度规模经营更有利于本地农业发展。适度规模为200~300亩土地,基本与家庭劳动力的经营上

限重合,能够实现土地集中高效利用,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二是筛选农业规模经营主体。鹅镇充分保障本地农民的土地权益,将耕地优先流转给本地村民耕种,推动农业规模经营与村庄社会协同发展,发挥农业的社会效益。三是发挥农业规模经营的社会价值。鹅镇政府认识到,农业规模经营发展必须推动村庄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农业规模经营发展应当提高村庄的整体福利,满足村庄人口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农业规模经营发展应当有利于村庄治理,为村庄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良好基础。

基于上述反思,鹅镇发展出更加适合本地的“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模式,该模式强调本地村民的土地权利和村社集体的组织功能,更加注重农业规模经营的村庄社会效益。概言之,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致力于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发展与村庄社会有效融合,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

### 三、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实践机制

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模式是鹅镇总结 10 年来农业发展经验的结果。自发的土地流转难以推动农业规模经营,地方政府的积极干预成为农业规模经营的直接推动力<sup>[31]</sup>。地方政府干预也必须控制在适度范围之内:一方面,地方政府不能过度干预农业规模经营实践;另一方面,农业规模经营发展必须以村社为本位,村社集体和农民主体性必须得到充分尊重和充分调动。换言之,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需要地方政府、村社集体和农民共同参与,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发展与村庄社会的有效融合。在实践运作过程中,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模式遵循“政府引导、村社统筹、农民参与”的实践运作机制。

#### (一) 政府行政引导

2008—2016 年,鹅镇政府过度介入农业经营,引发一系列问题,如土地利益分配问题和农业投机问题。2016 年地方政府改变大包大揽的行政风格,仅从宏观制度层面引导村社集体,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发展与村庄社会的有效融合。地方政府的行政引导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 1. 土地流转中的制度供给

农业规模经营的前提是土地连片,这需要地方政府通过制度设计引导村社集体整合细碎土地。细碎分散且高低不平的耕地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村民希望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整治项目平整农田,鹅镇政府借此契机并借鉴 2008 年以来的土地整合经验,对耕地进行整治。土地整治后耕作条件得到改善,那么土地如何分配呢?鹅镇的农业人口大量外出务工,愿意种田的村民仅占少数。村社集体和广大农户都希望把土地流转给愿意种田的农户。基于此,在县级政府的支持下,鹅镇政府积极推动土地虚拟确权<sup>①</sup>,引导村社集体广泛开展群众动员工作,以小组为单位“确权确亩不确地”。虚拟确权制度的出台,为村社集体统合土地经营权提供了制度合法性。

##### 2. 农业规模经营中的政策激励

2016 年以前,地方政府盲目推动大规模农业经营,效果并不理想。多年实践表明,以本地村民为经营主体,以 200~300 亩为经营规模,更加契合本地的农业规模经营发展。2016 年以后,地方政府开始支持 200~300 亩的家庭农场,并按照经营规模发放农业补贴、分配农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激励本地农户发展农业经营。鹅镇的农业补贴主要包括土地流转补贴、粮食作物种植补贴和农业机械燃油补贴等,这些补贴合计超过 130 元/亩,力度不可谓不大。在地方政府的政策激励下,本地村民发展农业经营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以鹅镇 S 村为例,2016 年本地

① 土地虚拟确权指的是只确定土地面积和村民组地块位置,不确定承包户的土地位置,农户获得虚拟地块的确权证书。

的农业经营主体达到了19个,其中本村的农业经营主体就有18个。

### 3. 农业规模经营中的风险防控

毁约弃耕和自然灾害是农业规模经营发展面临的两个主要风险。过去10余年,鹅镇的农业发展深受其害。2016年,地方政府为保护农民的农业收益和土地权益,积极引导村社集体建立风险防控机制。风险防控机制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保证金机制。保证金是风险防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营主体若想流转土地,必须缴纳600元/亩的保证金,地方政府为其在银行开设账户,利息收入仍归经营主体所有。保证金的设立可以防止经营主体弃地而逃,避免小农户的权益遭到损害。同时,地方政府以人性化的方式处理保证金,避免了农业经营主体遭受损失。二是政策性农业保险。为提高经营主体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防范农业生产风险及其可能引发的农业经营风险,县级政府设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水稻投保金额为300元/亩,保费按照5%收取,其中各级政府补贴80%,农户只需承担20%,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业经营风险。

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模式并不排斥政府干预,而是要求政府发挥引导和激励的作用,为村庄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提供充分的制度条件。鹅镇政府通过制度供给、政策激励和风险防控等具体机制,为本地农民流转土地和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和政策条件。同时,为农业规模经营发展与村庄社会有效融合奠定了客观基础。

## (二) 村社集体统筹

2016年,地方政府不再介入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实践环节,全权交予村社集体统筹。村社集体统筹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标志着农民以村社集体为单元组织起来共谋发展,这是农业规模经营发展自主性和自立性的重要体现。

### 1. 土地流转中的意见统合

在土地整体流转前,村社集体的核心工作是统合村民意见。在统合村民关于土地流转的意见时,村干部具有较强的策略性。村组干部事先召开内部会议,商议并确定土地流转基本思路;村组干部确定基本流转思路后,召开小范围的座谈会,听取部分村民的意见,主要参与者是村庄精英群体,如党员、村民代表等;通过听取精英群体的意见,村社集体形成基本的土地流转方案;在此基础上,村社集体召开村民大会进行决议。最终,2/3的村民都同意村社集体形成的土地流转方案。由此,土地流转的统合工作顺利完成。

### 2. 农业规模经营的方向选择

村社集体对细碎土地进行统合后,农户手中的土地经营权全部流转到村社集体,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发展农业规模经营。2016年,农业经营的利润十分可观,仍然有大量的工商资本想要流转土地发展农业,以期从中获利。此时,部分在村农户和外出务工的经济精英提出流转土地、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的要求。村社集体出于本地村民优先和防范土地流转风险的考量,决定不再将土地流转给工商资本。为了保证土地资源有效利用,同时让愿意种田的村民有田可种,村社集体制定了农户流转土地的规模上限。村组干部认为,100~300亩是农业经营的适度规模,既能保证土地集中高效利用,又能让愿意种田的村民有田可种。在村社集体的统筹下,愿意种田的村民基本都拿到了土地,规模大多在200亩左右。

### 3. 农业规模经营中的组织协调

村社集体统筹农业规模经营,意味着土地经营权掌握在村社集体手中,分散的农户不会对农业规模经营造成阻碍<sup>[32]</sup>。以村社集体尤其是以村民组为单位统筹农业规模经营,村民可以在农业经营主体选择、地租定价等方面形成统一意见,降低交易成本。必要时,村社集体也能代表村民与经营主体商议地租价格,确定双方都满意的地租价格,减少土地利益分配矛盾。以村社集体为农业规模经营的组织单元时,村社集体可以为村民提供各类服务,如核验农业经营主体资质、维护村民土地利益等;也可以承担协调者和见证者的角色,帮助村民与经营主体解决矛

盾纠纷,而无须承担主体责任和农业经营风险。

在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模式下,村民以本地土地资源为发展基础,通过自主组织的方式推动农业规模经营,有助于降低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保证农业规模经营发展的自主性和社会性价值。村社集体在农业经营过程中发挥组织协调作用,使得本地村民主导农业规模经营发展成为可能,有利于避免因农业经营风险而引发的村庄治理问题。

### (三) 农民自主参与

农民的自主参与体现在两个维度:土地流转的自主性与地租协商的自主性。

#### 1. 土地流转的自主性

土地流转的自主性涉及经营主体的确定问题。农民既可以自主决定土地是否流转以及流转给何种经营主体,也可以积极转入土地和参与农业规模经营。本地的中坚农民和返乡精英具有较强的农业经营意愿。中坚农民的收入来自村庄,他们通过在村务农和寻找村内收入机会维持生活。经济精英的收入主要来自村外,他们经过多年的努力积累了较多的经济财富,想在年老时返乡经营土地。中坚农民和返乡经济精英的社会关系、经济利益在村,并且熟悉农业生产规律,他们参与农业规模经营是对村庄发展资源的激活,对村庄具有重要意义。村民也倾向于将土地流转给这两类群体。不过,为了同时保证村民自主决策权利、自主参与权利以及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效益,村社集体要求,有意流转土地的本地村民,必须亲自到农户家里签订土地流转协议,而后村社集体根据其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分配相应面积的土地。这一筛选机制有效利用了村庄社会的内部资源,也剔除了信用较低、不务正业的村民,确保真正干事创业的村民成为农业经营主体。

#### 2. 地租协商的自主性

地租协商的自主性涉及地租价格制定过程。地租价格制定同样遵循农民自主决策原则。由于农业经营具有不确定性大、收益波动频繁的特点,地租价格需要通过周期性的调整来避免农业利润在村民和农业经营主体之间因不平等分配而引发的利益纠纷。村民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组织起来,整合程度较高,具备周期性调整地租价格的能力,得以依据土地位置、种植条件和交通条件等因素,与经营主体共同确定符合双方利益的地租价格,形成区域化的弹性地租。通过民主协商和自主决策方式确定地租,农民和经营主体形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分配关系,保证了农业规模经营的稳定性,避免了因农业经营风险引发的村庄社会矛盾。

在地方政府引导、村社集体统筹和农民自主参与的实践机制下,本地村民成为农业规模经营主体,流转土地的村民与农业经营主体形成了土地收益共享、农业经营风险共担的良性关系,有效抑制了农业规模经营可能引发的村庄治理风险。

可以看到,农业规模经营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含土地整合、土地流转和农业经营等内容。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村社集体和村民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共同推动农业规模经营与村庄社会融合。在农业规模经营发展过程中,自发的土地流转难以克服土地整合困境,需要地方政府积极引导,从而为土地整合奠定制度基础和资源基础,为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提供条件。同时,农民必须以村社为单位组织起来,通过村社集体统筹机制将分散的土地整合并整体流转,降低私人之间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sup>[33]</sup>,保证农业规模经营发展的自主性。最后,村民按照民主协商、自主决策的方式确定农业经营主体、协商地租,从而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土地权益,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发展与村庄的正向互动。

综上所述,在农业规模经营发展过程中,行政引导机制是前提条件,提供农业规模经营所需的物质资源和制度设计,为村庄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奠定基础。村社集体统筹机制是主导性发展方式,通过村社集体组织和村庄社会动员在实践层面完成细碎土地的整合和土地流转,保障农业规模经营发展秩序,保证农业规模经营的自主性和自立性。自主参与机制提供内生性动力,

充分保障了村民权利和土地权益,调动了村民参与积极性,激活了村庄内部的发展资源和农业发展活力(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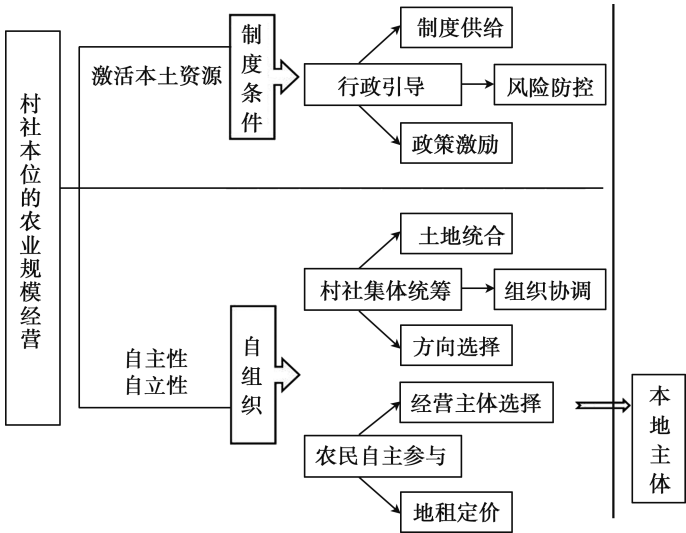


图 1 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机制

#### 四、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多元绩效

本文研究发现,以村社为本位发展农业规模经营,能够提高农业经营的经济效益,提升农业的社会效益,实现农业经营的村庄治理效益。换言之,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能够与村庄社会有效融合,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的根本目标。

##### (一) 农业规模经营的经济效益提升

在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模式下,农业经营主体是以本地中坚农民和经济精英为主的家庭农场。本地村民熟悉农业生产规律,注重农业生产的技术细节,更愿意用心管理农田。家庭农场依托家庭劳动力,经营规模普遍在 200~300 亩,兼具低劳动成本和规模优势的特点,也便于使用大机械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能够获得较高的亩均收益,也能获得较高的整体收益。

以鹅镇 S 村为例,当地小农户和中农户的生产效率相差不大,种植单季稻一般能达到 1000 斤/亩。农业企业的土地产出要低一些,且更容易遭受病虫害影响。以中坚农民和经济精英为主体的家庭农场,其土地产出能够达到 1200~1300 斤/亩,是所有经营主体中产量最高的。在土地整体流转前,小农户和中农户纯收益大约维持在 800~1000 元/亩。农业企业的纯收益仅为 400~500 元/亩,去除地租后只能勉强维持不亏损,一旦遭遇自然灾害便面临亏损的风险。以本地村民为主体的家庭农场,其纯收益为 650~750 元/亩,略低于小农户和中农户,但是明显高于农业企业。加上土地流转补贴、种植补贴等大约 130 元,其收益能够达到 780~880 元/亩。如果按照当地租金水平折算<sup>①</sup>,家庭农场去除地租后收益大约为 330~430 元/亩。小田并大田以后,农业经营的规模限制被打破,家庭劳动力的耕作边界扩张,以夫妻经营为特征的家庭农场可以管理 200~300 亩农田。与上述变化相对应的是,农业经营主体的整体经济效益提升,经营 200 亩土地可以获得 6 万~8 万元的收入,远远高于小农户和中农的整体收益。

① S 村的土地流转租金以 350 斤/亩稻谷为主,按照当年粮食保护价折算现金地租,此处以 2020 年粮食保护价 1.3 元计算。

## (二) 农业规模经营的社会效益溢出

在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模式下,农业经营的社会效益溢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生性经营主体为村社集体带来了发展活力,有助于村庄秩序的稳定;二是农业经济效益内部分享增加了村社成员福利,促进了村庄整体性发展。

农业规模经营能否产生社会效益,关键在于农业经营主体的选择。农业经营主体关乎农业经营和村庄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农业规模经营良性发展的关键。在小规模农业经营时期,农业经营主体是在村老人和中坚农民,农业经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大规模农业经营时期,农业经营的主体大多为农业企业。工商资本主导的农业企业具有趋利性,当农业经营出现市场风险时,农业企业就有可能毁约弃耕<sup>[34]</sup>。2008—2016年,鹅镇所在的金峨县出现了19起农业企业毁约弃耕的情况,造成了30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

在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模式下,村庄内生性经营主体得以激活,本地村民成为主要的农业经营主体。本地村民作为经营主体具有诸多好处:第一,本地村民对农业经营有稳定且长远的预期。第二,本地村民的农业经营风险较低。本地村民主导农业经营既能够保证农业生产效率,又能保证土地租金如期缴纳。即便遭遇农业经营风险,也不至于毁约弃耕。

村社本位的农业经济效益基本在村社内部分配,有助于形成正向的村庄互惠,从而提升全体村民的福利。一方面,内生性农业经营主体获取农业经营收益,他们再拿出部分收益向村民支付土地租金。农业经营主体和村民都能通过农业经营获得利益回馈,得以围绕农业规模经营发展形成互惠互利关系。另一方面,农业经营需要雇佣村庄剩余劳动力,内生性农业经营主体与村庄劳动力之间不仅是市场雇佣关系,更是熟人社会关系。在熟人关系的加持下,劳动力生产效率可以得到保障。换言之,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不仅能够增加在村劳动力的收入机会,而且通过熟人雇工的形式促进村庄内部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

综上,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能够实现发展收益在村社成员内部分配,并有效回馈村庄社会,提升村庄的整体福利。村民能够通过农业经营、流转土地或在村务工等形式共享农业规模经营收益,村庄社会得以维持人气与活力。

## (三) 农业规模经营的治理效益显著

在自发的小规模农业经营模式中,在村老人和中坚农民常年在村生活,与村庄保持着密切联系。中坚农民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关系在村,更愿意维护村庄社会秩序。村庄社会的公共决策以及公益项目建设,都需要中坚农民积极参与,中坚农民成为村庄治理倚重的关键力量。在行政主导的大规模农业经营模式下,农业企业的引入形成了对小农户和中坚农民的排斥,小农户和中坚农民不得不外出务工,导致村庄内生性治理资源流失<sup>[22]</sup>,村庄公共治理事务难以推进。

在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模式下,农业经营主体是中坚农民和返乡经济精英,他们是内生性经营主体,更是村庄治理的中坚力量。在村庄治理中,中坚农民和返乡精英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壮大村庄治理力量。他们是村庄中的精英群体,能力强、素质高、关系广。中坚农民和经济精英在村生产生活,因对村庄事务比较关心,也有较强的参与村庄治理的意愿<sup>[27]</sup>。这批人可以担任村干部、小组长和村民代表参与村庄治理,也可以作为普通农户参与村庄治理。村庄中的诸多事务,如公共品供给、公益事业和矛盾纠纷等,都需要这些村庄精英积极参与并建言献策,这是对村庄治理力量的有益补充。

二是维持村庄公共秩序。因农业规模经营发展而留在村庄的村民,更愿意参与村庄建设,为村庄秩序维持和村庄发展贡献力量<sup>[35]</sup>。这批人在村生产生活,不可避免地村庄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大多是中老年人,有着稳定的村庄生活预期,具有强烈的维持村庄社会秩序的动机。同样,以S村为例,近5年来S村申请了大量公共建设类项目,其中不乏一事一议项目。一事一议项目需要村庄自筹部分建设资金,中坚农民和经济精英往往出钱出力最为积极。

在公共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经常出现“钉子户”,村干部解决不了时,需要借助中坚农民和经济精英的力量,只要他们出面,大部分“钉子户”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可以看到,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发展起来后,村庄治理效益得到显著提升。中农和返乡经济精英成为农业经营主体,他们能够在兼顾农业生产的同时,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对村庄治理产生了积极影响(表 1)。

表 1  不同农业规模经营模式的绩效比较

类别	自发的小规模农业经营	行政主导的大规模农业经营	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
经营主体	小农、中农	农业企业	家庭农场
主要优势	精耕细作、劳动力成本低	资本雄厚、生产技术先进	规模适中、精细化管理、劳动力成本低
主要不足	规模较小、经营分散化	管理粗放、农业投机	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
经济效益	一般	较低	较高
社会效益	较高	较低	较高
治理效益	较高	较低	较高

综上所述,农业经营模式深刻影响农业经营主体类型、农业经营效益和农业经营的社会性价值。从实践效果来看,通过在村庄内部分配发展成果,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兼顾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治理效益,对于村庄社会整体性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实现了农业规模经营与村庄社会的发展融合。

五、结论与讨论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发展与村庄社会有效融合从而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模式的考察,重点讨论了两个问题:其一,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的实践机制,以及在此过程中与村庄社会的融合状况;其二,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的实践绩效。通过梳理鹅镇 10 年来的农业经营发展历程发现,该地农业经营经历了自发的小规模经营和行政主导的大规模经营两个阶段,这两种农业规模经营模式存在明显局限。鹅镇于 2016 年变革农业规模经营模式,形成了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与村庄社会有效融合。

在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模式运作过程中,地方政府、村社集体和农民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政府引导、村社统筹、农民参与”的实践运作机制。地方政府通过制度供给、政策引导和风险防控等方式,为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奠定了制度基础和动力条件。村社集体通过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意见统合、农业规模经营的方向引导和组织协调,奠定了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的组织基础,保证了农业规模经营发展的自主性和自立性。农民在土地流转、农业经营主体筛选和地租定价过程中,通过民主协商、自主决策,积极参与农业规模经营发展过程,体现了农业规模经营发展的农民主体性。

研究发现,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与村庄社会高度融合,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应,是更加契合农业转型和村庄社会发展的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形态。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充分激活村庄内部的发展性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土地资源以及人力资源。上述资源都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较低的风险性,能够激发村庄的农业经营活力。二是提高了农业经营的经济效应。农业规模经营发展克服了土地细碎化、土地抛荒等农业问题,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为内生性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民带来了较高的经济效益,增加了村庄社会的发展活力,促进了村庄社会的产业振兴。三是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治理效益。农业规模经营高度嵌入村庄社会,其产生的经济效益最终回馈村庄社会,对村庄整体性发展和村庄治理产生了积极

影响。

鹅镇农业规模经营的启示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推动农业规模经营发展,应当加入农民视角和社区视角<sup>[36]</sup>,走内生发展之路。农业规模经营发展应调动多元主体参与的积极性,使其共同致力于农业规模经营与村庄社会有效融合,促进农民福利和村庄社会整体性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应当妥善处理地方政府、村社集体和农民的定位:首先,地方政府应当发挥积极引导作用,既要避免过度干预农业规模经营实践,又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和激励政策推动农业规模经营良性发展。其次,村社集体应发挥统筹功能,把握农业规模经营发展方向,组织协调农业规模经营实践,积极引导农业规模经营发展,增进农民福利和村庄整体性福祉。同时,村社集体应在农业经营过程中承担协调者和服务者角色,为农业规模经营发展提供组织条件。最后,农民应充分发挥主体性作用。村社集体应充分尊重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鼓励有意愿、有能力的村民开展农业经营,并为其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农民应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制度的优越性,积极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通过民主协商和自主决策的方式解决农业经营的具体问题。

### 参考文献:

- [1] 杜志雄,肖卫东.农业规模化经营:现状、问题和政策选择[J].江淮论坛,2019(4):11-19.
- [2] 孙新华.再造农业——皖南河镇的政府干预与农业转型(2007—2014)[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5:10-12.
- [3]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乡村振兴迈出新大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三[EB/OL].(2019-08-07)[2021-01-23].[http://www.stats.gov.cn/ztlj/zthd/sjtjr/d10j/70cj/201909/t20190906\\_1696322.html](http://www.stats.gov.cn/ztlj/zthd/sjtjr/d10j/70cj/201909/t20190906_1696322.html).
- [4]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土地问题》课题组,张曙光.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J].管理世界,2010(7):66-85.
- [5] 刘凤芹.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与效果研究:以东北农村为例[J].管理世界,2006(9):71-79.
- [6] 黄祖辉,王朋.农村土地流转:现状、问题及对策——兼论土地流转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影响[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8(2):38-47.
- [7] 王化起,朱娅.农业科技、土地确权与农业补贴——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发生条件的再验证[J].华东经济管理,2020,34(9):91-97.
- [8] 高强,刘同山,孔祥智.家庭农场的制度解析:特征、发生机制与效应[J].经济学家,2013(6):48-56.
- [9] 孙新华.土地流转与农户家计:两种流转模式的比较——基于江西省T村的实证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2012(4):77-83.
- [10] 夏益国,宫春生.粮食安全视阈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新型职业农民——耦合机制、国际经验与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2015,36(5):56-64.
- [11] 张照新,赵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困境摆脱及其体制机制创新[J].改革,2013(2):78-87.
- [12] 贺雪峰.谁是农民——三农政策重点与中国现代农业发展道路选择[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92.
- [13] 谭林丽,孙新华.当前农业规模经营的三种路径[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0(6):50-56.
- [14] 朱启臻,胡鹏辉,许汉泽.论家庭农场:优势、条件与规模[J].农业经济问题,2014,35(7):11-17.
- [15] 黄廷廷.家庭农场优势与农地规模化的路径选择[J].重庆社会科学,2010(5):20-23.
- [16] 胡新艳,陈文晖,罗必良.资本下乡如何能够带动农户经营——基于江西省绿能模式的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21,42(1):69-81.
- [17] 高晓燕,任坤.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J].江汉论坛,2020(7):31-38.
- [18] 张良.“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公共性建构[J].中国农村观察,2016(3):16-26.
- [19] 赵晓峰,赵祥云.农地规模经营与农村社会阶层结构重塑——兼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社会学命题[J].中国农村观察,2016(6):55-66.
- [20] 陆自荣.中国农业资本化的逻辑与限度——以马克思社会劳动的技术剩余为视角[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7(3):5-21.

- [21] 安永军.政权“悬浮”、小农经营体系解体与资本下乡——兼论资本下乡对村庄治理的影响[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1):33-40.
- [22] 孙新华,冷芳.社区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及其社会基础[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9(6):1-10.
- [23] 王志刚,黄棋.内生式发展模式的演进过程——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述评[J].教学与研究,2009(3):72-76.
- [24] 张环宙,黄超超,周永广.内生式发展模式研究综述[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7(2):61-68.
- [25] 王新志,杜志雄.小农户与家庭农场:内涵特征、属性差异及演化逻辑[J].理论学刊,2020(5):93-101.
- [26] 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17(12):117-137.
- [27] 贺雪峰.论中坚农民[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4):1-6.
- [28] 黄宗智.农业合作化路径选择的两大盲点:东亚农业合作化历史经验的启示[J].开放时代,2015(5):18-35.
- [29] 吴重庆,张慧鹏.小农与乡村振兴——现代农业产业分工体系中小农户的结构性困境与出路[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1):13-24.
- [30] 张进选.家庭经营制:农业生产制度长期的必然选择[J].农业经济问题,2003,24(5):46-51.
- [31] 孙新华.地方政府干预与规模农业发展——来自皖南河镇的体验[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7(2):114-123.
- [32] 刘远凤,伍飘宇.三权分置下“确权悖论”的制度破解[J].经济学家,2018(5):89-97.
- [33] 王海娟,胡守庚.土地细碎化与土地流转市场的优化路径研究[J].学术研究,2019(7):45-52.
- [34] 吕军书,贾威.“三权分置”制度下农村土地流转失约风险的防范机制研究[J].理论与改革,2017(6):181-188.
- [35] 梁伟.乡村振兴背景下农地流转制度创新研究——制度特征、运行机制与绩效分析[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9(3):87-97.
- [36] 韩鹏云.农业规模经营的实践逻辑及其反思[J].农村经济,2020(4):17-25.

(责任编辑:刘浩)

## “Village-based”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Performance

LIANG Wei

**Abstract:** Promoting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operations to promote rural social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topic for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he experience of Goose Town shows that the village-based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 model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 and this model realizes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village society.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is model relies on three important mechanisms: First, local government guidance, that is, to guide village collectives to develop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s through institutional supply, policy incentives, and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second, collective planning of villages, that is, the integration of scattered land to achieve overall circulation, so as to coordinate the practice of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 the third, the independent participation of farmers, that is, farmers independently determine the main body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 democratically negotiate land rent prices, and share interests and risks with the main body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s. Under this model, the scale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s is moderate and the economic benefits are high, the social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s overflow, and the village governance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 are more significant.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o modern agri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 we should focus on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 and village society, so as to promote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farmer welfare and village society.

**Keywords:**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 Community-base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